

哲学問題討論輯第二輯

中国哲学史問題 讨论专辑

哲学研究編輯部編輯
科学出版社出版

哲學問題討論輯第二集

中國哲學史問題討論專輯

哲學研究編輯部編輯
科學出版社出版

1957·北京

哲学問題討論輯第二集
中国哲学史問題討論专輯

哲学研究編輯部編輯

*

科学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11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經售

*

1957年7月第一版 書號：0825 字數：383,000
1957年7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京) 1—10,215 印張：16 5/8 插頁：3

定价：(9) 2.50元

編者的話

这一本专輯，是搜集本年一月廿二日至廿六日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所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材料选輯而成。参加这次討論会的有國內的著名哲学家、哲学教学及研究工作者一百余人。所涉及的有关哲学史方面的問題是很广泛的，这些問題的主要方面是：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及如何正确地处理哲学史問題；对于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应如何予以适当的估价問題；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繼承問題。这些問題也都是过去在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中所遇到的比較重大的問題。我們为了帮助从事哲学史工作者对于这些問題的研究和解决，特将这本专輯編輯出来供参考。

在被搜集于本专輯的五十几篇文章中，有的是在討論会前所写的文章；有的是在討論会中的發言或在討論会后所写的文章。这里面約有半数的篇章是已在報紙和杂志上發表过的，約有半数是尚未發表的；也有極个别的是未参加討論会者的来稿。我們的編輯工作，大体是在“集思广益”和“去同存异”的原則下进行的。在編輯工作中我們曾得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志們的帮助很大，这里謹向他們致謝。

目 录

- 开放唯心主义 郑 听 (1)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問題 馮友兰 (11)
关于“两个問題”的补充意見 馮友兰 (24)
我們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問題 朱伯昆 (29)
談談學習西方哲学史的問題 洪 謙 (37)
- 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 任繼愈 (46)
一个問題，一点意見 汪 穀 (54)
論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討論
 及其目前存在的一些問題 石 峻 (61)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范围問題 張岱年 (79)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問題 朱謙之 (87)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問題 朱啓賢 (93)
談談关于哲学史的对象問題 韓樹英 (105)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科学性和党性 楊宪邦 (114)
关于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的几个問題 張岱年 (132)
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所遇到的几个困难
 問題 任繼愈 (139)
关于中国哲学史中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
 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問題 張恒寿 (146)

談思想兩棲	朱光潛	(157)
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与中国哲學史	魏明經	(160)
哲學史研究的方法与目的問題	王太庆	(174)
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爭論問題的意見	賀 麟	(186)
关于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評价問題	賀 麟	(196)
对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問題	陈修斋	(203)
关于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		
問題	关 鋒	(205)
略談对唯心主义的評价問題	張世英	(216)
关于对唯心主义的估价問題的一些意見	陈修斋	(225)
如何对待唯心主义	張岱年	(237)
关于对待唯心主义問題	王方名	(245)
談談哲学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傾向	任 华	(261)
讀了关鋒先生“关于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 唯心主义的斗争問題”以后	邓初民	(265)
中国哲学遗产的繼承問題	馮友兰	(273)
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繼承問題的补充意見	馮友兰	(281)
必須重視祖国哲学遗产的特点和价值	周輔成	(286)
道德的阶级性和繼承性	張岱年	(295)
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繼承問題	朱啓賢	(297)
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繼承問題的几点意見	楊正典	(322)
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繼承問題的錯誤觀點	黃子通	(333)
关于哲学遗产的繼承問題	張岱年	(342)
中国哲学史中的繼承性問題	定 思	(346)

我对几个哲学問題的看法	吳恩裕	(351)
談談哲学遗产的繼承問題	湯一介	(359)
关于繼承哲学遗产的一个問題	关 鋒	(369)
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繼承問題”的一点意見	燕鳴軒	(388)
論哲学遗产的具体意义与抽象意义的区分	趙僕生	(391)
怎样認識哲学中的阶级性和繼承性的关系	張恩慈 沈少周	(397)
談哲学遗产的繼承問題	楊潔民	(404)
怎样理解馬克思主义哲学的繼承性	肖蓬父	(413)
关于繼承祖国哲学遗产的目的和方法問題	肖蓬父	(423)
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繼承問題”的一些意見	艾思奇	(437)

讀馮友兰先生“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

問題”的一点意見	李志達	(442)
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前社会历史理論中有沒有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	孙长江	(452)
我贊成馮友兰先生的看法	羊华荣	(463)
对馬克思主義以前历史觀的評價的一些意見	戴清亮 林可濟	(473)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引起的三个問題	唐 錄	(490)
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些意見	溫公頤	(498)
关于哲学史的研究	胡 繩	(504)

开放唯心主义

郑 听

陆定一部长在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说：“人民内部……在思想上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也还将存在。……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不管是宣传唯物主义或者是宣传唯心主义，都是有自由的，……总而言之，我们主张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又主张人民内部一定要有自由。”理论和政策都说得十分明确；政策是根据理论和事实来的。“人民日报”的扩充篇幅和大学中开设唯心主义的课程是政策的具体实施。我想就包括“开放唯心主义”在内的“百家争鸣”政策谈谈我们思想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学术与政治矛盾的问题——和就开设唯心主义课程这件事谈谈我们对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有关联的。我们在人民内部开放唯心主义是解决我们思想中长期存在的学术与政治矛盾的钥匙；学术与政治的矛盾，应归结为学术服务于政治的更高的形式。而正确地估计唯心主义，是对唯心主义展开斗争和最终战胜唯心主义的前提。

先谈第一个问题。这个英明的政策的现实意义是重大的。它对从旧中国走来的广大知识分子说是一个思想解放。它替知识分子解决了一个主要的思想矛盾——学术与政治的矛盾。

解放以来，我们的政治觉悟普遍地提高了，但我们的唯心主义的

学术思想却原封未动或动得不多。我們既是唯物主义者又是唯心主义者：在公开的場合是唯物主义者，在書斋里是唯心主义者；在政治上是唯物主义者，在学术思想上是唯心主义者。這是我們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形成，是和解放后的客觀形势分不开的。为着将情况談清楚，先从我自己說起。

我在“五四”以后即接触到先进人物和先进思想，在政治上分清了是非，但是我却学了唯心主义哲学——康德哲学。我的公式是：政治是管正义的，哲学是追求真理的。“一个腔子里关着两个灵魂”。我这样的过了二十多年，直到解放前夕（1948年），革命的火焰已燒到眉睫，我还發表了一篇“高調哲学与低調哲学”。馬克思列宁主义是“低調哲学”，是“治国平天下”的；康德哲学是“高調哲学”是“安身立命”的。解放后国家的盛况，使我不得不佩服指导革命胜利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覺得康德哲学無用。几年来国家在各个战綫上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大地的外表和人們的内心都改变了，千年的梦想實現了，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使人感到無限幸福，用詩人歌德的話說：“在这一刹那里，我感覺自己渺小同时偉大”。我們每个人都感覺年輕了，心中蘊藏着一股說不出的力量和責任感。這是我們新的道德境界。新社会的“治国平天下”和“安身立命”是統一的。康德哲学于是遭到最后的否定。学校里当时集体學習馬克思列宁主义，廢掉唯心主义的課程，老教师不教課，也加强自己抛弃旧哲学的信念。我想用军队“讓防”来比喻我的处理新旧思想、新旧哲学的矛盾，好像潰退的军队“讓防”給占領軍，一方撤出去，另一方开进来；新与旧根本未会面，更說不上交鋒了。但是思想意識并不同于军队，想“讓防”是办不到的。旧思想虽然表面上宣告“撤退”了，实际上却埋伏着極大的潜勢力，随时阻碍新思想的“接防”。

我們的拋棄唯心主義和接受唯物主義，首先是與政治聯繫着的。爾後經過思想改造，“三反”“五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批判，“肅反”等一系列運動，都是將唯心主義思想和反動政治及反動階級聯繫着。政治熱情多一些的人，早已經洗了手，宣稱與唯心主義無關，自己站到唯物主義一邊來了；政治代替了哲學。政治上還有保留的人，也“壓”下了自己的唯心主義，願意充當唯物主義的伙伴。黨號召對胡適、胡風的思想和對梁漱溟先生的思想進行批判，於是大家找他們的書，分析和批判他們的唯心主義，也都沒有必要要碰到自己的唯心主義。隱藏着的唯心主義思想和公開的政治熱情，“兩峰對峙，雙水分流”，各不相攬。

兩種思想情況，兩種錯誤。一種是“政治即是學術”的“左”傾的錯誤思想。我們是心悅誠服地承認了辯証唯物主義的真理。但承認不等於認識，認識不等於能實踐。我們宣稱自己是辯証唯物主義者。這是善良的願望，但願望不等於事實。在學理上已經感覺到學習之不易，聯繫到工作和生活，更不能“得心應手”，為什麼舊思想意識作祟，新學理並未成為我們血肉相聯的東西呢？時光荏苒，七年匆匆過去，新的並未學好，舊的付諸遺忘。今天檢查起來，新的之所以未學好，固然由於帶舊思路學新東西，不易奏效；但沒有結合舊的學新的，應該是新的未學好的主要的原因。我們為什麼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主義，簡單地拋棄了舊哲學？其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即是哲學”的“左”傾思想作祟。這個錯誤的思想，使新與舊割裂。愈不敢正視舊的，愈不肯用新觀點來衡量舊的，新與舊也愈分裂。願意保持新與舊的分裂的思想，與其說是對舊的厭惡，毋寧說是對新的無信心。北京大學前些時來了一位英國的凱因斯主義者，我們很大方地請他講演，而我們一位曾經相信過凱因斯的进步教授却不想替他翻譯，怕勾引起對凱因斯的“旧

情”；我們真的相信馬克思从前門迎进来，凱因斯从后门送出去了。这就是上面所分析的思想“讓防”“接防”。如果思想里还有凱因斯，提不提他都一样地存在。还是提他比較稳当。只有認真地和他“接触”才能真正地和他“決裂”。对凱因斯如此，对别的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法律学家……也如此。我們中間有不少人对开放唯心主义是不放心的。他們怕这样做就会“引起思想混乱”，就意味着“对唯心主义的讓步”，甚至就是“提倡唯心主义”。这些都是迴避唯心主义的“左”傾思想。这种思想是在我們中間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

另一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錯誤思想。持这种觀点的人，原先对政治是有距离的。后来政治認識和政治热情提高了，“为学术而学术”的觀点并未去掉，于是他和主張“学术即政治”的人一道走进隱藏的唯心主义和公开的政治热情的“二元世界”。这样就妨碍我們在思想上真正地、踏实地接受辯証唯物主义。辯証唯物主义成了我們应世的工具，变成我們工作中的“标語”、“标签”，而思想、感情和實踐并未跟上去。为什么人們对自己的唯心主义的思想諱莫如深呢？因为怕和政治联系上。这样，学术思想（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和唯心主义一道，成为政治立場、觀点的“牺牲品”。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改造、資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和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胜利，严格說来，都是不徹底的和表面的。这就是旧哲学界的一般思想情况（旧經濟学界，历史学界，法律学界……也并不两样）。所以我說：我們許多人都既是唯物主义者（在政治上）又都是唯心主义者（在学术上）。周总理和陆部长所估計的：知識界的政治思想情况已經有了根本变化，并且正在發生更进一步的根本变化是完全正确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也是事实。“百家爭鳴”政策，是解决这个深刻矛盾的鑰匙。这也就是我前面

所說：“百家爭鳴”政策，是对从旧中国走过来的广大知識分子的思想解放。为什么是“思想解放”？从前，唯心主义思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压”下去了，在政治上要求进步的热情下，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换了防”，唯心主义成了政治反动的代名詞，只許批判，不許辯護，唯心主义思想掩藏得愈深愈牢靠。今天，学术观点不再和政治直接联系了，批判和辯護唯心主义，是自由爭論的两方，这就給有唯心主义思想的人以無限自由的感觉。自由是改造的起点。只許批判，不許辯護，就很难使人心服。不能心服的拥护和不能心服的批判，都是不徹底的，表面的。尽管唯心主义是不正确的，但容許有辯護唯心主义的自由，这就能激發一个有唯心主义思想的人，在他的政治觉悟的基础上乐于改造自己批判自己的唯心主义，逐渐走上唯物主义的道路。

“百家爭鳴”对旧知識分子提供了学术与政治結合的条件，替他們开辟了学术如何正确地服务于政治的道路。对我自己說：“百家爭鳴”的号召，喚醒了我对旧學問的兴趣。我相信在重理旧業的同时，我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水平会逐渐提高的。这是我对这个偉大政策的直接的感受。

当我初听到“百家爭鳴”的号召时，我也和許多朋友一样，耽心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我当时想：我們掌握政权才七年；唯物主义思想还未在广大干部心中生根；應該做正面文章，不必忙于“开放唯心主义”等等。几个月来我对这个問題想得很多，給我的教育也最深刻，理解到人的意識往往落后于存在这条真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在突飞猛进，国际关系在迅速展开，事物在急驟的变化，而我們的思想还是停留在建立革命秩序时的思想阶段，使我对这样高瞻远瞩的政策感到“突然”；我們的思想就是这样地落后于实际生活的。学术服务于政治是正确的，但，不是在任何时候用同

样的方式都同样正确。学术与政治的矛盾，用哲学的术语说，有它的同一性方面，也有它的差异性方面。解放初期，多强调一些它的同一性是有必要的。现在客观情况变了，原来的矛盾也就向它的对立面——差异性转化，它反映着学术对政治相对独立性的真理。现在多强调一些学术与政治的差异性，正是把学术服务于政治提高到更高的阶段和更新的形式。如果还用刚刚建立革命秩序时的老公式，就会对我们不利而有利于敌人。

下面想谈谈学校中开设唯心主义课程的意义。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的大学里，开设唯心主义课程，的确是不平凡的事。它的政治意义在于说明我们的社会已转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到不需要对唯心主义作政治上的“戒备”了。在人民内部我们听唯心主义思想和唯物主义思想自由争辩，自由竞赛，这就说明了我们的大学里有比资本主义国家多得无比的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叫马克思主义进大学的门，但是他们夸口他们的“学术自由”；而我们却叫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自由讲授，这就充分说明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在人民民主政权下的人民是能充分享受民主与自由的。这里使我想起还滞留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朋友们。你们不要再存顾虑，不要再听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客们的恶毒宣传了；祖国殷切期待你们回来自由研究和自由讲学，祖国的空气是自由的。

我们将要开设两类唯心主义的课程，一类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心主义，像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一类是现代的唯心主义，像罗素哲学。对前一类的唯心主义包含马克思主义继承性问题。对两类唯心论都需要作正确的估价，而且还要考虑到，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它们，才对于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有用处。

我们过去因为一切措施都要符合建立革命秩序的要求，对马

克思主義的革命性一面強調得多一些，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性一面強調得少一些，那也是很自然的。現在我們有條件多想這方面的問題了。這也是“百家爭鳴”替我們帶來的任務之一。我想談談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之一：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

德國從 1781 年康德“純理性批判”出版那一年起，到 1821 年黑格爾“法權哲學”出版那一年止的短短四十年間，德國的唯心主義的哲學家們給人類創造了寶貴的精神財富。正確地對待德國唯心主義，就能給馬克思列寧主義帶來豐富的歷史遺產。所以恩格斯說：“德國的工人運動乃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繼承者”。“我們，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却以我們不僅繼承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而且繼承康德，菲希特和黑格爾為光榮。”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輕視這一份歷史遺產，甚至于對它作簡單的否定。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對他們的唯心主義的體系作任何的“同情的了解”。尤其對他們右派的後裔的“修正”、添補，一定要堅決地摒棄。這個工作是細致的，冷靜的，它是我們的立場的嚴肅的考驗。做好這部分工作，就會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有益處。但是我們過去對德國唯心主義存在着兩種錯誤的傾向：“左”的虛無主義的態度和右的“洋粹主義”的態度。其實也是兩種教條主義。有前一種傾向的人，只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革命性一面，而忽略它的繼承性一面，專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書中找否定康德、黑格爾的辭句，而看不見書中肯定康德、黑格爾哲學中有益因素的辭句。後一種正相反，過分夸張馬克思列寧主義繼承性一面，而不深刻理解它的革命性一面，只會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書中找肯定康德、黑格爾的辭句，而忽視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對康德、黑格爾严厉的、原則性的批判。這兩種傾向都是錯誤的，因此也是有害的。只有還原他們的本來面目，才是正確的。最好是能够將他們哲學

中关键性問題勾画出来，和馬克思列寧主义哲学問題对立和衔接起来，使我們有个明确的發展的綫索，这就对我們的哲学干部有用。过分地夸张德国唯心主义的意义和作用是不必要的；但把它当作一种哲学史的知識来學習，对于我們的哲学干部說是有用的，也是必要的。对于講述唯心主义哲学的人說，这是改造我們唯心主义思想最好的机会。我們多用一分实事求是的精神，即多靠近一分唯物主义，多离开一分唯心主义。

过去的宣傳品或課堂中对現代的唯心主义的批判都是用“一棍子打死”的办法，事實證明这样做，對我們并無好处。我們对現代西方資產阶级的唯心主义者的估計是不够全面的，下面几点即常被忽略：

(1) 他們都是脑力劳动者，一般都是有自尊心的人。直接願意为帝国主义政治服务的人畢竟是少数（罗素近來亦贊成和平了）。

(2) 他們一般都是学有根底的人。西方資產阶级社会三百年来的学术傳統是有它的科学水平的，太胡鬧的人不能在大学里講学，不能著書立說。

(3) 他們的唯心主义的体系，他們替科学所作的哲学結論和替哲学所作的政治結論都是錯誤的，我們呵斥之为“反动透頂”、“腐朽透頂”，主要的是指这方面說的。

(4) 在認識論(和邏輯)方面，有它細致和深入的一面，尽管是歪曲的、片面的。

我們这样提法是否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風”呢？不是的。为着在思想战綫上立于不敗之地，我們尽管在战略上要藐視敌人，但在战术上要重視敌人，对他们作比較全面的估計，对于我们是無害的。

我們面临着的敵人是強大的。西方的資產階級，自馬克思主義出現在歷史舞台以後，花費了很大的氣力，培养了很大的學術隊伍來保衛自己的“文化堡壘”，他們的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也隨着自然科學最新的成就而日益精巧。他們所慘淡經營的是哲學與科學的“聯盟”，他們想造成假象：他們是代表“科學的哲學”。列寧在“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中揭露了他們的“物理學的唯心主義”和“生理學的唯心主義”的方向，但是，列寧並未結束這個戰鬥。科學一日千里地發展，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亦日益精巧地利用這個發展來武裝自己。結束戰鬥是不可能的，戰鬥的規模只能日益擴大和深刻化；想一棍子打死敵人是辦不到的。當然，任何唯心主義都不能和科學有真正的聯繫，而只能這樣那樣地歪曲科學來遷就他們的唯心主義的觀點；而唯物主義却天然地是科學的同盟軍。我們的哲學工作者几乎都不能很好地掌握科學知識，這是我們的重大缺點之一。黨組織了自然科學家們研究“自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組織哲學家和科學家的“聯盟”；北京大學的哲學系招收理科的畢業生充當研究生；請理科的教授給哲學系開“自然科學基礎”的課程；此外提高哲學史的教學質量，不將哲學史局限於唯物、唯心鬥爭的框子里，而給它以豐富的內容，提高學生外國語水平等等，來武裝我們的青年干部。我們要想在哲學領域內取得勝利，要做許多準備工作。同唯心主義作鬥爭，是“打硬仗”，是學術競賽，是長期的鬥爭。結束鬥爭的思想，是懶漢思想，是無遠見的思想，是自滿情緒的表現。這些都是保守思想的根源，我們要對它十分警惕。

為着最後战胜唯心主義，就要深入地研究唯心主義；要做具體分析工作；不能以政治口號代替論証。這樣做對於我們是有利的；倒不是企圖使西方的唯心主義折服，首先是，使我們自己陣營里的

对唯心主义作某些保留，作某些讓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唯心主义爱好的朋友們，感觉到我們的工作是說理的而不是武斷的，是細致的而不是粗糙的，使他們也乐于加入我們的战斗。

“百家爭鳴”政策，使我們的阵营扩大，战斗力加强，这将形成哲学工作者——年老的和年輕的——空前的團結。辯証唯物主义是人类最后一个哲学体系，它已經作为思想武器贏得在九亿人口的土地上自由傳播的权利，我們只有繼續不断地来丰富它，才不愧为我們这个时代的哲学工作者。包括开放唯心主义在内的“百家爭鳴”政策，是党对知識分子政策和文化政策的新阶段；这个政策本身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重大的發展。它是这样地高瞻远瞩和振奋人心；特別是对于知識分子來說。他們深切地感到党对他們在政治上的信任和在学术上的重視；他們将会使出最大的力量来搞好他們的崗位工作。我們的哲学界通过“百家爭鳴”政策的貫徹执行，将会呈現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